

葉德輝對校讎學、目錄學、版本學三者關係的理解

沈俊平(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圖書館助理圖書館員)

摘要

清乾嘉時期的目錄學者曾對校讎學和目錄學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以為目錄學以外無校讎學，有的認為校讎學外無目錄學。近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依據校讎學、目錄學和版本學三者發展的歷史源流軌跡來理解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本文據葉德輝的版本目錄學著作，如《書林清話》、《書林餘話》、《觀古堂藏書目》等來論述其對校讎學、目錄學和版本學三者關係的理解。

關鍵詞：葉德輝 校讎學 目錄學 版本學

葉德輝(1864-1927)，字奐彬(也作煥彬)，號直山，一號郇園，湖南湘潭縣人。(註 1)是近代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大半生從事版本目錄學工作，撰有不少影響深遠的版本目錄學著作，有《藏書十約》、《書林清話》、《書林餘話》、《觀古堂藏書目》、《郇園讀書志》等等。其弟子楊樹達(1885-1956)評其版本目錄學說他“淹通目錄，識別版藏。凡雕刻源流，傳本真贗，莫不駢列在胸，指數如畫。”(註 2)謝國楨(1901-1982)亦讚譽他“精於目錄之學，能于正經正史之外，獨具別裁，旁取史料，開後人治學之門徑。”(註 3)說明其版本目錄

學的造詣頗為深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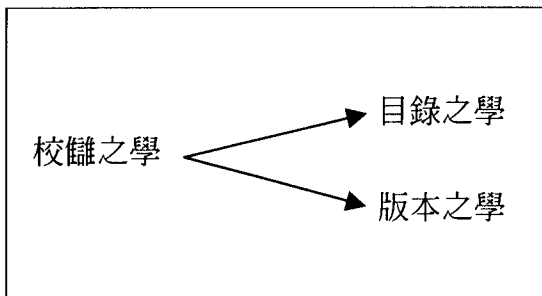
關於校讎學、目錄學和版本學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在學術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以目錄學和版本學二者之間的關係來說，有人認為“版本學是目錄學的一部分”(註 4)，也有人認為版本學“應該是可以成為一門專門的科學”。(註 5)那麼，葉德輝對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又是做怎樣的理解呢？

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以下簡稱《清話》)卷一〈板本之名稱〉中說：

近人言藏書者，分目錄、板本為兩種學派。大約官家之書，自《崇文總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是為目錄之學。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晉汲古閣，及康熙乾嘉以來各藏書家，于宋元本舊鈔，是為板本之學。然二者兼校讎，是又為校勘之學。本朝文治超軼宋元，皆此三者為之根柢，固不得謂為無益之事也。(註 6)

葉德輝在這裏所謂的“近人”，應是指從宋代起至清末的目錄學者。葉德輝把校讎學、目錄學和版本學這三種學問看作是清代學術的“根柢”，純粹是從目錄學家的眼光來立論，顯然有欠公允，同時版本之學只提到“私家之藏”，不談官修的版本目錄，如對《天祿琳琅書目》等存而不論，也有些失之眉睫，不夠謹嚴。但我們認為葉德輝對目錄學和版本學之間關係的理解，還是相當正確的。如試作圖解，他的系統歸屬應是如此：



通過以上的圖解，說明了兩個觀點：一、目錄和版本學是統於校讎學之下的；二、目錄學和版本學是獨立的學科。

葉德輝以為目錄學統括於校讎學下，可以說是為清乾嘉時期學者們對校讎學和目錄學的關係的爭議提供了更合

理的答案。這是因為“乾嘉以後一般學者，不但使目錄之學脫離校讎學而獨立，簡直是不承認校讎之可以為學”。(註 7)首先堂堂皇皇掛起目錄學招牌的是王鳴盛(1722-1797)，他在《十七史商榷》開宗明義第一條目下就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得其門而入。”(註 8)又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註 9)之後從王鳴盛而和之者也不乏其人。如孫德謙(1869-1935)說：“鄭樵《通志·校讎略》，其論編次者，為目凡七……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而校讎者，目錄之學，非僅後世校讎家但辨訂文字而已，是可知也。”(註 10)張爾田(1874-1945)亦說：“《隋書經籍志·簿錄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跡，疑則古之制。’知校讎者，目錄之學也。”(註 11)

對堅持於目錄學以外沒有校讎學的學者的那種忘本截流的觀點，一些學者是無法苟同的，章學誠(1738-1801)在《信摭》中說：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辯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

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敘例異同，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彼則笑而不言。真是貧兒賣弄家私，不值一笑矣。(註12)

章學誠根本不承認在校讎學外，別有目錄之學，且予以譏訕。針對章學誠的批評，蔣元卿說：

固然章氏所說，未免過於偏激。但乾嘉時代一般所謂目錄學家只注意“篇卷參差，敘例異同”，“惟爭辯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也是十分真確的事。這樣不知輕重，逐流忘本的惡現象，無怪章氏要大肆譏訕了。(註13)

張舜徽在《中國校讎學敘論》一文中指出：

近三百年來，我國理董舊聞的學者們的治學風氣，每喜將門路分得很窄，此疆彼界，各有範圍。單從學術分工的角度來看問題，自然有他們各自深入鑽研的成績。但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後果，卻也不少。這在過去博學通人們，都已道破此中偏蔽了。清代學者強調“目錄學”的作用，卻把它和“校讎學”對立起來，很少人注意到“目錄”只是“校讎學”中的一部分。……我們推原到西漢末年，由政府組織人力進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清理圖書的時候，劉向、劉歆父子受詔校書，首先是廣羅異

本，其次是勘對文字，最後才將群書編定目錄。這三方面的工作，總名為“校讎”。三者必互相聯繫，不可分割，才能發揮它的作用。(註14)

王鳴盛、趙爾田等學者強調目錄學外沒有校讎學的觀點固然不妥，但章學誠以為校讎學外無目錄學的觀點亦有值得商榷的餘地。況且章學誠的只承認校讎學，不承認目錄學的觀點，據昌彼得研究，“實則從章氏的著作來看，他所反覆研討的，只有詳類例，明編次，而不及文字校勘的方法，正是乾嘉以降目錄學研究的領域”。(註15)

因此，葉德輝對校讎學和目錄學的關係，是承認目錄學是獨立之學外，也承認目錄學乃廣義校讎學的一部分，這種見解顯然異于王鳴盛派和章學誠派。葉德輝對校讎學和目錄學關係的這種理解，顯然不是為了避免開罪王鳴盛派或章學誠派的任何一方而所採取的折衷、中庸的辦法。它反映葉德輝能夠推本溯源，以及對當時學術發展趨勢有正確認識，因而能得出對校讎學和目錄學關係的正確理解。

另外，如果單從以上的圖解來看，目錄學和版本學在葉德輝眼裏似乎是各自獨立的學科，不相依存。那麼，在葉德輝看來，目錄學和版本學是各自獨立的學科？還是互相依存的學科呢？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一些討論版本和版本學的話語應該可以給我們提供明確的答案。我們首先看他對“版本”這個名

稱的解釋，他說：

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馮道始奏請官鑄《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版本初不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秘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據此而論，雕版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於是板本二字合爲一名。（註16）據葉德輝考證，“本”初指未雕板以前的寫本，“板”初指雕板印行的書本。雕板盛行以後，才合爲“板本”，專指刻板書本。這是“板本”最初的含義。那麼，作爲獨立學科的版本學是何時產生的呢？葉德輝以爲版本學是在“板本”出現以後，在目錄中產生的。他指出：

古人私家藏書必自撰目錄，今世所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是也。……諸家所藏，多者三萬卷，少者一二萬卷，無所謂異本、

重本也。自鑄板興，於是兼言板本。其例創于宋尤袤《遂初堂書目》。目中所錄，一書多至數本。有成都石經本，秘閣本，舊監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舊杭本，嚴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麗本，此類書以正經正史爲多，大約皆州郡公使庫本也。同時岳珂刻《九經三傳》，其〈沿革例〉所稱，有監本，唐石刻本，晉左福銅版本，京師大字舊本，紹興初監本，監中現行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別板本，宋末士大夫已開其風。（註17）

以上文字反映了葉德輝對版本學緣起的看法。他認爲版本學起源於私人藏書目錄。由於雕板盛行，印書能力大爲提高，故出現了“一書多至數本”的現象。這使藏書家在自撰目錄中，開始著錄異本和辨別板本，這就產生了版本學。南宋初期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首創其例，南宋岳珂(1183-1234)《九經三傳·沿革例》中對版本的著錄更爲詳悉。這些都是在私人目錄中出現的，也就是說，版本學是在目錄學中產生的。當然，葉德輝所談，是指正式著錄和辨別板本而言。他沒有談及在雕板書出現以前，早在漢代就出現了在目錄中著錄版本資料的先例，例如劉向(約前77-前6)校書《別錄》，這是版本學與目錄學同源的例證。不過，他說的在目錄學中正式著錄版本起于尤袤是正確的，版本學產生於目錄學中也是對的。

版本的研究，雖然在宋代已蔚為風氣，南宋初期尤表《遂初堂書目》就是一部首創版本學先例的版本目錄專書。但版本學與目錄學之間的界限尚不是十分明確。誠如葉德輝所說，分為兩派的現象主要是明清間的情況。葉德輝在《書林餘話》卷下轉錄了他為《四部叢刊》所撰〈例言〉提到：“古書記載行字，濫觴于明季”。（註 18）對於這句話，師道剛評論說：

我想可能是指明周弘祖《古今書刻》、劉若愚《內版經書記略》、朱睦《授經圖》之類專講行格版本的著作而言。若葉氏所言不誤，則版本鑒定之學，有例可循，轉入細密是從明末開始的。（註 19）

這段話說版本學從明末開始往獨立學科的方向前進。葉德輝說：

明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注有宋本、元本、舊抄、影宋、校宋本等字。……江陰李鶚《得月樓書目》，亦注宋板、元板、鈔本字。國初季振宜《季滄葦書目》、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首均別為宋板書目。徐乾學《傳是樓宋元本書目》，至以專名屬之，顧不詳其刻于何地何時，猶是飲尊之意。明范氏《天一閣書目》，載宋元明刻及鈔本字頗詳。（註 20）

毛扆(1640-?)《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李鶚(生卒年不詳)《得月樓書目》、季振宜(1630-?)《季滄葦書目》、錢曾(1628-1701)《述古堂藏書目》等書的問

世，反映了明清之際士大夫之間矜貴版本的風習時尚。葉德輝又指出，版本學的興盛是在清乾嘉間：

自康、雍以來，宋元舊刻日稀，而紳士林佞宋秘宋之風，遂成一時佳話。乾隆四十年，大學士于敏中奉敕編《天祿琳琅書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類，于刊刻時地、收藏姓名、印記一一為之考證。嘉慶二年，以《前編》未盡及書成以後所得，敕彭元瑞等為《後編》二十卷，是為官書言板本之始。《四庫全書提要浙江採集遺書總錄》、《閩集》，亦偶及之。其後臣民之家，孫星衍有《祠堂書目內編》、《外編》，宋元舊板並同時所刻，分別注明。自為《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補編》、《續編》。陳宗又為之編《廉石居藏書記》。吳焯有《繡谷亭薰習錄》，吳壽有《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附錄》。黃丕烈有《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記》、《再續》、《百宋一廬書錄》，顧廣圻為作《百宋一廬賦》。張金吾有《愛日精廬藏書志》、《續志》。……楊守敬有《日本訪書志》，又有《留真譜》。繆荃孫有《藝風堂藏書記》、《續記》，又編《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此外，傅沅叔增湘、況夔笙周頤、何厚甫培元收藏與過眼頗多，均有存目，尚未編定。蓋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來，談此學者咸視為身心性命之事，斯豈長恩有靈與，何沆瀣相承不絕如是也。外此諸家文集、日記、雜誌亦多涉之。……

大抵於所見古書，非有考據，即有題記。
(註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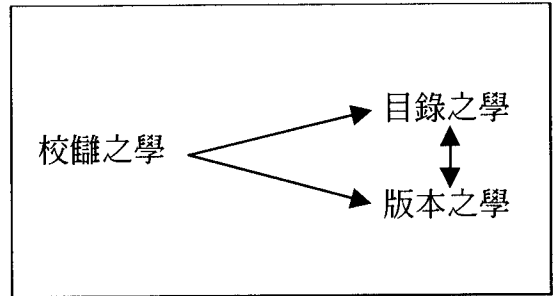
這說明，版本學在清乾嘉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其標誌：(一)在此期間，不但私人目錄中盛談版本，在公家目錄中也大談版本之學了。(二)版本學研究的範圍急劇擴大，它不單著錄異本，對版本的時代、刊刻地點、收藏姓名、印記等也逐一進行研究。這使版本學發展成一種專門的學科。從此，版本之學更爲人們所重視。不少卓有成就的版本學家和水平頗高的版本學著作也隨之陸續湧現，研究的範圍愈加廣泛，用心愈加精細。他們或重考訂，或精校讎，或善賞鑒，取得了巨大成果。

葉德輝更進一步指出鑒別古籍版本離不開古籍書目，他說：“鑒別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錄始。”以爲“不通目錄，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僞撰抄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註 22)的確，古籍書目是考訂版本異同和圖書存佚的工具，知道了圖書存佚，有利於識別僞本。

以上的討論說明在葉德輝眼裏，版本學是自目錄學產生，之後雖獨立成學，但在鑒別古籍版本的過程中仍不能脫離古籍書目，仍必須以它們爲依據，是鑒定古籍不可或缺的工具。從這裏，我們看到版本學是離不開目錄學的。那麼，反過來說，在葉德輝的目錄學系統裏，目錄學是否可以脫離版本學而獨立呢？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只能通過葉德

輝的目錄學著作來尋求答案。通過其藏書目錄—《觀古堂藏書目》，(註 23)我們發現其著錄專案包括書名、卷數、著者、版本項等內容。在這些專案中，版本項與版本學的關係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書名、卷數、著者等項內容也與版本學有關。例如同書異名就是版本問題，知道了不同版本的同書異名，在著錄書名的時候，就不至於張冠李戴。若從這個側面看，說明目錄學是離不開版本學的，相信葉德輝本人也不會否認這種說法。

因此，結合以上的討論，我們知道葉德輝對目錄學和版本學關係的系統應該是：



目錄學和版本學在校讎學的統轄下，從它們本身的發展歷史和研究內容看，獨立成學是完全可以的；但從研究目錄學和編制目錄書來說，版本學則是目錄學不可或分而密切相連的一門學科；反之，若從研究版本學來說，又何嘗能夠置目錄學於不論呢？因此，葉德輝對目錄學和版本學的關係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

葉德輝對於校讎學、目錄學和版本

學三者關係的理解，並非其一人之卓識，實乃時代之產物。當時一些學者已有相同的認識。這種認識淵源於古代圖書整理圖書工作的長期歷史實踐。當然，這種理解也是有清一代考據學繁榮興旺下的產物。葉德輝之後的學者如傅增湘(1872-1949)和余嘉錫(1883-1955)等，基本上對校讎學、目錄學和版本學三者關係有大體一致的認識。

總的說來，葉德輝對校讎學、目錄學、版本學關係的觀點，主要是根據三者發展的歷史源流軌跡來立論，因而能夠得出較乾嘉學者更為正確、客觀的理解。

註 解

註 1 有關葉德輝的生平與研究，詳參湯志鈞編《戊戌變法人物傳稿》，見清代傳記叢刊·名人類 (23)(臺北：明文書局，1985)，頁 273-275；閔爾昌纂錄《碑補集補》，見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5)，頁 427-429；《碑補集補》，見清代傳記叢刊·儒林類(1)，內收許崇熙《邵園先生墓誌銘》頁 509-511、佚名《葉邵園事略》，頁 513-517；蔡冠洛編纂《清代七百名人傳》第 3 冊，見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9)，頁 502-503；卞孝萱、唐文權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

1995)，頁 422-423；崔建英整理《邵園學行記》，見近代史資料第 57 號(1985 年)，頁 107-145；Booman, Howard L.(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5-37；湖南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人物志》(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頁 582-583；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長沙：岳麓書社，1986)；蔡芳定《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註 2 楊樹達《邵園全書序》，見楊著，積微居詩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83-84。

註 3 謝國楨《叢書刊刻源流考》，見謝著，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 223。

註 4 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香港：中華書店，1985)，頁 3。

註 5 顧廷龍，《版本學與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委員會，古籍版本研究組《版本學研究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頁 103-104。

註 6 葉德輝，《書林清話》(以下簡稱《清話》)卷一，〈板本之名稱〉(長沙：岳麓書社，1999)，頁 21-22。

註 7 蔣元卿《校讎學史》，見民國叢

- 書第三編第 42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頁 179。
- 註 8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 1，清光緒十九年(1893 年)廣雅書局覆刻本，頁 1。
- 註 9 同上，卷 17，頁 1。
- 註 10 同上，轉引自蔣元卿《校讎學史》，頁 179。
- 註 11 張爾田《劉向校讎學纂微》，轉引自蔣元卿，校讎學史，頁 178。
- 註 12 章學誠《信摭》，見《章氏遺書外篇》卷一，吳興劉氏嘉業堂本，頁 8 下-9 上。
- 註 13 同 7，頁 180。
- 註 14 張舜徽《中國校讎學敘論》，見《華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 年 1 月，轉引自彭斐章、謝灼華、喬好勤編，目錄學研究文獻彙編(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頁 135。
- 註 15 昌彼得《章實齋的目錄學》，見昌著，版本目錄學論叢(二)(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頁 79。
- 註 16 同 6，頁 21。
- 註 17 《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版本〉，頁 4-5。
- 註 18 葉德輝，書林餘話(以下簡稱《餘話》)卷下(長沙：岳麓書社，1999)，頁 290。
- 註 19 師道剛，版本與目錄之關係淺釋：中西目錄學分類比較觀，見《版本學研究論文選集》，頁 354。
- 註 20 同 17，頁 5。
- 註 21 同上，頁 5-7。
- 註 22 葉德輝《藏書十約》、〈鑒別〉，見李慶西標校，葉德輝書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 5。
- 註 23 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目(長沙：葉氏觀古堂，1915)。有關《觀古堂藏書目》的研究，可參閱蔡芳定〈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目》析探〉，見中國學術年刊第 16 期，1995 年。